

中共代表参加了 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吗

戚厚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全面抗战。为国共合作抗战事,蒋介石邀中国共产党人派代表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为代表到南京。对于中共代表在南京是否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的问题,不少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者持肯定态度,而对于中共代表在该会议上的所达成的协议或意见则说法不一。事实真相到底怎样,现根据档案及其他资料辨证之,也请有关方家不吝指教。

第一,中共代表到达南京日期的问题。

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达南京的时间有两说:一是8月9日,如《朱德年谱》^①和《叶剑英年谱》^②;一是8月10日,如《周恩来传》^③。那么中共代表到底是哪一天抵达南京的呢?

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称:8月9日,“共军总司令朱德飞抵南京;龙云自云南抵南京”。^④据龙云回忆:8月9日,龙云乘坐欧亚航空公司包机在西安停留,经在西安的蒋鼎文介绍,龙云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机飞往南京。^⑤《中央日报》的报道也是8月9日。^⑥

由此可见,中共代表抵达南京的时间当为1937年8月9日。

第二,中共代表是否参加了国防会议的问题。

对此,一些专家几乎众口一词,认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国防会议,但在什么时间参加了会议说法甚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

8月7日说,如《抗日战争大事典》^⑦和何理^⑧、阮家新^⑨等,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出席了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7日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

8月9日说,如《八路军史》^⑩和宋平等,8月9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出席会议。

8月11日说,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由西安飞赴南京参加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68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7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450页。

④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版。

⑤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⑥ 《龙云抵蓉定今日飞京》《中央日报》1937年8月8日,第3版。

⑦ 武克全主编:《抗日战争大事典》,学林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8页。

⑧ 何理:《抗战战略方针及战略格局的形成》,《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

⑨ 阮家新:《关于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再探讨》,载《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编:《1945—1995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

⑩ 张立华、董宝训著:《八路军史》,青岛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国防会议,并在11日的会议上,就我党关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作了阐述。

8月12日说,如《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大事记》8月12日,我党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代表红军由西安去南京出席国防会议。^①

8月说,如徐焰:“1937年8月,共产党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的代表向国民党当局明确表示,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是我们坚持的原则立场。”^②

还有一种是没有确定时间,但认为中共代表参加国防会议了,如张宪文:(7月)20日,蒋介石由庐山返南京。其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应邀出席最高国防会议期间,与蒋介石在南京就红军改编后的人数、设立总指挥部和保持独立自主等问题,继续进行磋商。^③荣维木认为:在共产党参加的国防会议上,两党进行了抗日作战的分工……^④

一些人对中共代表参加的会议的名称说法也不一样,有的说是国防会议,有的说是国防最高会议。

那么中共代表到底参加还是没有参加国防会议或国防最高会议?根据中共代表抵达南京的时间,8月7日参加说可以否定。那么中共代表是否在8月9日以后在南京期间参加了国防会议了呢?据《周恩来传》周恩来于1937年8月9日至21日在南京期间,没有参加过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或国防最高会议的叙述。^⑤叶剑英在南京停留的时间最长,他在朱德8月19日、周恩来8月21日离开南京后至11月下旬基本上在南京,但《叶剑英年谱》没有他参加国防会议或国防最高会议的记载。^⑥

而《朱德年谱》说,朱德于8月11日参加了南京国防会议并作了发言。但《朱德传》^⑦却说8月11日朱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发言,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事实究竟是朱德是参加了国防会议还是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呢?这要看8月11日国民政府是否召开过国防会议。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国民政府没有在这一天召开国防会议或国防最高会议的记载。而在这一天的下午4时,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训练总监唐生智等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何应钦的官邸就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举行谈话会,也就是《朱德传》中所说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⑧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学者认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国防会议呢?笔者认为,一是国民党方面确实邀请过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8月1日,蒋介石的代表张冲急电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第二天,周恩来复电张冲:如开国防会议,则同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则同博古、林伯渠、叶剑英去。8月4日,张冲回电称:开国防会议。^⑨由此可能让很多学者认为中共代表到南京一定参加了国防会议或国防最高会议了。

① 雷德昌编著《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大事记(1937.7.7—1945.9.2)》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② 徐焰:《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形成及相互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③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82页。

④ 荣维木:《对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看法》,《百年潮》2007年第8期。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450至453页。

⑥ 《叶剑英年谱》,第176页至210页。

⑦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8页。

⑧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军政长官及幕僚几乎每日在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官邸举行会报、会谈,研究应付方略。这些会谈记录的档案目录为“何应钦官邸谈话记录(内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8月11日谈话记录)”七八七.2430《民国档案》于1987年第23期与1995年第2期予以公布,有中共代表谈话内容的标题是: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军政机关长官谈话记录。以下简称“谈话会”。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450页。

8月7日下午,国民政府在南京励志社召开了国防联席会议,参加者除了国民政府最高领导者,还有各地方的军政长官共41人。会议的议题是:1.卢沟桥事变之经过及其措置;2.军事准备事项;3.大讨讨论;4.关于战费问题之研究;5.各委员发表意见;6.决议;7.议长致词。会上,与会人员“不约而同”起立“作决心抗战之表示”。^①

为了召开这次会议,会前国民政府通知各地军政长官到南京赴会。据《中央日报》报道:山西的阎锡山8月2日到南京;广东的余汉谋、湖南的何键在8月3日到南京;广西的白崇禧于8月4日到南京;何成浚8月5日由汉口到南京;贵州省主席顾祝同、湖北省主席黄绍竑于8月6日分由重庆、武汉到南京,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也在这一天由上海来到南京。云南的龙云准备8月8日偕卢汉乘欧亚航空公司包机由成都与刘湘同来南京,但刘湘“以各项要务,亟待请示中枢”,决定提前于8月7日晨乘中航机飞南京。^②龙云于8月8日飞成都,9日过陕飞南京。^③笔者认为国民政府因抗战事急迫而提前召开了国防联席会议,中共代表与龙云才没有参加。对此,程潜在国防联席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可作旁证:“自(7月)8日敌人向我挑衅发生战事后,以时间的不允许等待,特提前召集各方同志,来讨论制敌救亡的大计,已于今晨在国府会议厅开会。这次各位同志的踊跃参加,或远道赶来,这实是我战必胜的象征。同时,各位同志都有重任在身,对于会期也就加以缩短了。”^④由于这个原因没有参加国防联席会议的不仅中共代表和龙云,还有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他也是8月9日抵达南京的。

一些学者可能将8月11日的国共双方的军政长官的谈话会当成了国防会议。8月11日下午4时,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与国民党方面的何应钦、唐生智、白崇禧、黄绍竑、卫立煌、陈继承等就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举行谈话会。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都作了发言。^⑤

可以断定,蒋介石邀请中共代表参加的既不是国防会议,也不是国防最高会议,而是国防联席会议,中共代表实际参加的是国共双方军政长官的谈话会。

第三,专家们对中共代表在南京与国民党会谈中磋商的主要问题、国共双方达成了什么共识说法也不一样,主要观点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11日的会议上,就我党关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作了阐述。^⑥

张宪文认为,中共代表在南京期间“与蒋介石在南京就红军改编后的人数、设立总指挥部和保持独立自主等问题,继续进行磋商”。^⑦

阮家新说,国共“全体一致议决应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⑧

徐焰说,中共代表向国民党当局明确表示,“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是我们坚持的原则立场”。^⑨

罗焕章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就中共中央关于战略计划与作战原则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① 《国防联席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七八七·2431。

② 《刘湘昨由蓉飞京》《中央日报》1937年8月8日,第4版。

③ 《龙云抵蓉定今日飞京》《中央日报》1937年8月9日,第3版。

④ 《国防联席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七八七·2431。

⑤ 何应钦官邸谈话记录(内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8月11日谈话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七八七·2430。

⑥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第26页。

⑦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第482页。

⑧ 阮家新:《关于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再探讨》。

⑨ 徐焰:《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形成及相互作用》。

并就有关问题作了补充说明:不可因外交谋略而动摇抗战决心,应迅速部署全国军民的动员,按作战方向划分战区,确定部队作战序列,依北伐时期的经验,统一施行军队政治工作,立即派出力量组织敌后民众,注意发动回蒙等少数民族群众参加抗战。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持久战的基本方针相当一部分重要建议,实际上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采纳。^①

荣维木说,“在共产党参加的国防会议上,两党进行了抗日作战的分工,即由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抗击日军侵略的任务,而由共产党的军队担负侧面牵制日军的任务”。^②

综合《周恩来传》、《朱德年谱》、《朱德传》、《叶剑英年谱》等资料,笔者认为中共代表在南京期间与国民党方面主要磋商了八路军改编与《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的有关问题。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红军改编后参加抗战的作战方针,中共代表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反复的谈判。蒋介石、何应钦最后同意:八路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只作侧面作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③

另外,中共代表在与国民党军政长官谈话会上就抗日战争作战的战略战术提出建议。朱德在谈话会上的发言最有代表性,他说: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然要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目前用兵方向主要是华北,但从目前情况判断,敌人必然会进攻上海,以吸引我国兵力。在抗战中应该加强政治工作,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朱德还建议开办游击训练班等。^④

周恩来、叶剑英还就民众动员,武装民众,战区划分,军制和利用北伐经验,开展军队政治工作,粮食与外交等提出了建议^⑤,这些建议对国民党以后的抗日作战无疑起到了重大的影响。^⑥

(作者戚厚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罗焕章、支绍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② 荣维木:《对抗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看法》。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451至452页。

④ 分见《朱德传》第398页;何应钦官邸谈话记录(内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8月11日谈话记录)。

⑤ 何应钦官邸谈话记录(内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8月11日谈话记录)。

⑥ 参见戚厚杰:《略论抗战爆发后中共对正面战场的建议及其作用》,《民国档案》1997年第2期。